

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民生观的矫正与转型

马 兵

(西南交通大学 政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重庆三峡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 重庆 404000)

[摘 要]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现代性建构历程是社会主义民生观的重要发育期。它不但矫正了文革时期民生观念的异化,而且实现了对民生主义的接续与转型,揭示出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与民生观塑造的进程具有双向互动性,进而形成了具有建构性、重叠性、社会历史性特质的,以经济民生、权益民生、文化民生为内涵的“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民生观。

[关键词]改革开放;民生观;现代性;转型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3)01-0019-05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进程中,民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最大共识。民生作为一个极具深刻性的命题,并非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当孙中山先把“民生”提升至“主义”甚至历史观的高度之时,民生随即成为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核心观念之一。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民生的价值与功能从民生主义的提出至今仍然保持了其相对的稳定性,改善民生仍然被视为党和政府重要执政理念与执政目标。因此,有必要审视与厘清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民生观念的内在结构、转型规律、致思特质,为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的民生问题、推进民生的改善提供思想理论原则的指导和学理支撑,为民生问题的复杂性做“社会发展和转型代价”的合理性说明,从而使社会主义民生观在当代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中化为凝聚人心与力量的“精神粘合剂”和“精神营养剂”。

一、改革开放实现对民生主义的 接续:民生观的归位

自孙中山明确提出民生主义的命题,民生主义就被视为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追求。民生主义体现

出对传统民本思想转化的最初表达。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建构则构成了民生观的重要逻辑外延。新中国成立后,民生观虽然一度出现乌托邦式的异化,但中国共产党却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赋予了其时代内涵与表述方式。

(一)民生观的转化催生出改革开放

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初衷是为了使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避免西方现代性出现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之弊端。民生主义在反思西方现代性“恶果”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均地权以实现国民共享”、“兴实业以发达国家资本”,力求实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现代社会组织蓝图。但是历史语境与其阶级本性使得民生主义失去了践行的现实土壤而显现出其“理想性”一面。民生主义虽具有乌托邦特质的思想前提,但在中国现代性建构道路上的启蒙意义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至1949年,“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民族建构成为了其对中国现代性建构中追求的第一性问题。民族独立是民生的前提,没有民族自主性,民生便无从谈起。因此,民族构成了民生观的逻辑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科学发展观与发展方式转型的哲学研究”(编号:11XZX003)。

[收稿日期]2012-07-29

[作者简介]马兵,男,重庆三峡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

延,围绕“民生”建构民族国家的自主性问题成为了中国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基本目标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近代以来继辛亥革命后对民族国家的崭新重构。由此,民生价值目标——“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1] (P.236)}的实践前提得以实现。由于民生主义的创建者以及毛泽东对其的继承皆是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下进行的,因此民生主义难以褪除浪漫主义革命道德观对其所赋予的方法论色彩。毛泽东虽然具有强烈的民生观念,但是他重视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工农业生产,忽视对个体的现实关切;注重追求社会公平但又造成平均主义的普遍贫困化;过多地把民生问题的解决置于理想化的革命道德之下,片面夸大无产阶级道德精神的建构作用,而忽视市场与效率的法则,致使改善民生物质基础不但没有得到巩固,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停滞与倒退。

国民经济的几近崩溃、普遍化贫穷的民众生计、落后的科技与教育以及停滞不前的民主法治建设等如此凸显的民生问题显然是对“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 (P.293)}这个首要任务的背离。因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 (P.86)}因此,民生问题不会随着无产阶级获得政权而自行消解,而是随着社会组织蓝图的重构而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为了破解中国的民生迷局,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民生建设的基础意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 (P.63)}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进程中“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 (P.15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进程中的民生主义获得了实践意义上的确认与接续以及改革开放的时代规定。

(二) 民生观获得改革开放的重新启蒙

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并非内生性的,而是西方坚船利炮强加的。所以中国人对西方的现代性明显带有一种防范心理,产生了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在中国现代性建构进程中则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也就是说,中国一直在追求自身现代性的内源性,从而建构出既能够消除西方现代性“恶果”,又要借助于西方现代性理性主义的示范效应,而且还要具有体现中华民族特质的现代性建构之路。改革开放前的民生观显然只是在注重防范、批判、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导致的民生不平等,而忽略了现代性理性主义的示范性在当时历史语境中满足民生诉求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其为民生建设提供了动力,其深刻性更多地表现在它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性的第二次启蒙。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培育了理性精神,祛除了“左”的魅惑,科学、理性地对民生观念进行了重新的“价值判断”,实现了民生观念的理性重写。理性精神是现代性建构的核心理念。改革开放所确立的理性精神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基本内涵和价值取向的。正是由于此种理性精神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从毛泽东式的阐释中摆脱出来,恢复了毛泽东所舍弃的现代性建构在后发现代国家必备的一些基本要素,民生问题的解决必须按照社会经济规律办事。民生观的注意力从此由阶级斗争、精神革命转向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启蒙价值在于其不但复归了民生作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发展目标,而且遵循着现代性建构的基本规律,对民生观中的异化因素进行了彻底矫正,即确立市场原则、科技理性、效率优先等在现代性建构中的优先地位。不过,改革开放对于民生观的启蒙更具有创造性和超越性的价值在于,邓小平所设计的改革开放在恢复现代性工具理性解决民生诉求的同时,并没有舍弃对现代性悖论的防范,而是建立起了在发展市场经济、重视效率的背景下的共同富裕——这个民生平等价值的社会主义本质命题,同时提出了制定、践行民生政策的“四人民”标准,表达出了改革开放启蒙中所追求的强烈的民生意识。

改革开放通过对社会主义与现代性成长的现实把握,立足于“后发外生”的初级阶段,实现了对民生观念的凯旋和启蒙,并使民生观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进行融合统一,不仅开拓出了异于西方

而又超越孙中山与毛泽东满足民生诉求的独特道路,而且为民生观的转型与升级提供了思想资源,指明了发展方向。

二、改革开放以来民生观的转型 升级“三位一体”的民生观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持续深入,民生观念由经济民生转向权益民生和文化民生,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对改善民生的思考和对民生建设的实践。“三位一体”的民生观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民生观把握日臻理性。

(一) 经济民生: 民生建设的基础

经济民生,是指物质层面的民众的生存、生活和生计等状态。经济民生构成了“生存型民生”的最基本内容。经济民生建设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主要解决与民众生存所必须的基本生活,如衣、食、住、用、行等问题,以致使民众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为民众的发展机会与发展能力提供基本物质条件。经济民生乃是解决一切民生问题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是民众对正当物质利益思变的结果,“文革”对生产力的破坏使得中国人的基本温饱缺乏物质基础。因此,当时最大的民生是解决人民群众的生存问题即由需求短缺造成的“吃饭”问题和“贫困”问题。而摆脱贫困、消灭贫穷必然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发展的首要位置。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式的民生观建构范式。他解释到“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4] (P.314)} 用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抓住了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更加符合民生的急迫期待。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增长迅速,经济质量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这个衡量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经济民生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二) 权益民生: 民生建设的核心

权益民生,是指法权意义上的生存、生活、生计和发展等状态,即广大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受法

律保护的权力和利益。权益民生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通过法律与政策的制定来维护和扩大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和各项利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权益即权利与利益,是一个远比需要更为深刻的范畴。人的权益是唯物史观建构的原初始基,并赋予了权益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的价值。也就是说,权益构成了物质资料生产这个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源泉。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 (P.82)} 列宁说过“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否则,你们就不能达到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6] (PP.571-572)} 所以,关注并维护民众的权益对激发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性以及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发挥着内核驱动的作用。

在现代性发展价值取向的引领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经济民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建设与发展,但是现代性发展观所带来的风险性并没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失去其效能的发挥。伴随而来的是市场法则和片面追求效率所造成公平难以被兼顾的局面,从而出现了财富增长迅速与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利益分化、财富集中使大多数人的民生权益无法得到合理的满足,中国的民生建设面临跌落“拉美陷阱”的危险境地。此外,把民生建设简单地认为是经济上的满足,出现了民生GDP化,片面强调物质生产,甚至把物质生产视为发展的终极价值,民生被异化为生产的工具而已。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经济民生绝非是作为衡量民生建设的惟一指标。民生建设应该坚持公平正义,力促人人获得发展的机会,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均等、分配合理。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权益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精神文化需要、社会公共需要,使每个人皆能获得平等参与发展的机会并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意味着不仅把民生改善落实到民众的生存这个基本民生层次上,而且更加注重以社会公平正义、政治参与为核心内容的权益民生。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意味着民生观不但注重民众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开始关注公民权益对于生存与发展的保障性作用,同时它为“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给予了法理意义上的阐释。2007年,物权法的制定与实施,则为巩固民生成果、维护民生财富、平衡民生权益、树立民生现

代性价值、促进民生和谐提供了可靠的法制保证。

(三) 文化民生: 民生建设的灵魂

文化民生,是指民众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层面的需求与满足。换言之,文化民生就是在满足物质民生基础上,超越对物质的片面追逐,凸显鲜活的精神自由与自我实现,最终为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意义提供条件和可能。文化民生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和“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表明,中国现代性社会组织蓝图建构并没有规避掉“现代性悖谬”。“工具主义理性不仅已经扩展了它的范围,而且也有控制我们生活的威胁。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事情,却要按收益或‘代价—利益’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要按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7] (P.6)} 人类充分享受工具主义理性带来的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灵魂世界却陷入了空虚与堕落的境地。人格和人生的异化与不安让生活的意义迷失了方向。“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但对于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然无知。”^{[8] (P.25)} 物质生活的增值同精神文化生活的贬值之间的反比悖谬迫切需要文化民生建设的支援与矫正。于此同时,随着经济民生建设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使民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增强。如何创造出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成果以满足民众需求及消费,实现文化惠民,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和社会的认同感,并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提供新型引擎等,同样需要文化民生的现实与终极的关怀。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文化民生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了文化民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领航作用以及文化民生的战略目标,即“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9]。文化民生理念的提出实现了民生观内涵的进一步提升,同时标志着改革开放进程中“三位一体”的民生观就此形成。

三、改革开放以来民生观转型与升级的三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生观的转型与升级是一个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运动过程。此过程不论是从转型的结构还是转型的机理上看,皆反映出了民生观转型的广度、深度以及与时代的契合度。这种直面当代民生实践的气质,是通过建构性、重叠性和社会历史性特征而得以展现的。

(一) 建构性特征

改革开放进程中民生观转型与升级表现出极强的建构性特征,这种特征是在具体的民生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基于后发现代国家的民生实践规律来看,现代化之初的民生建设一般侧重于关注经济与物质层面,而当经济达到足以满足人的基本民生诉求后,民生建设的目标就会转向注重民生质量的提升。这种现象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现代性建构机理获得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民生需求存在三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其中生存需要是最基本层次的需要,这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2] (P.79)}。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2] (P.79)}。也就是说,民生诉求一旦创造出第一个前提,它就会把这个前提吸纳为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民生诉求有了一个崭新的发展起点。人的需求的开放性的社会性遗传方式表明,人的生存问题即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在此基础上民生新诉求即权益民生与文化民生相继被建构为民生观的重要内涵。而这个建构性的过程则是通过意向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超动物性生存”的民生需求而得以确立的。

此外,现代性建构的机理当中的“多向度”性表明,现代性建构的进程不能仅视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单向度、单调的现代性转向,而是从传统社会制度的封建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宗教信仰、个人依附而向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社会正义化、个人主体化转型的多向度、复调的现代性。金耀基认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有三个主旋律:其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其二,从君主王朝向民主国家的转型;其三,文化的转

型,由经学向科学的转型。从此理论维度查看,民生观的转型乃是属于“三大主旋律”中的“次旋律”。所以,其转型必然具有从属性,受到转型“三大主旋律”的制约与推动。由此可见,民生观的转型与提升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三大主旋律”的展开,而依次由经济民生转向权益民生和文化民生的建构。而此种意义上的建构性特征将随着现代性这个未完成的方案,持续地、系统地、无终止地进行下去。

(二) 重叠性特征

从经济民生到权益民生再到文化民生,虽然形成了一个建构性的过程,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替代或是前者的消亡,而应该认作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能够创造历史和生活的条件。也就是说,不管是经济民生还是权益民生以及文化民生,他们只不过是民生观不同层级内涵的扩展,亦或是对民生观认识的深化而已,三者实则属于一体。正如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合力”时所分析的那样“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0] (P.697)} 由此可知,经济民生、权益民生和文化民生的关系如同“每一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一样,三者之间的任何一体乃是构成民生观的不同层次与结构,这些结构具有独特性,自成系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但彼此之间又互为系统,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重叠存在。经济民生是基础,权益民生是保障,文化民生则具有引领的作用。因此,在具体的民生实践中需要正确认识与处理重点突破与统筹兼顾的关系,使民生建设形神俱佳、相得益彰。

(三) 社会历史性特征

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以现实的人的生存及其条件为价值取向和出发点。它不但关注人的现实生存,而且更加重视人的生存活动的社会历史境遇。民生观的社会历史性指民生观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萌发、生成、发展都受到社会条件的影

响和制约。首先,“三位一体”民生观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中逐步“融合”的历史进程,表现出生长的周期性。其次,“三位一体”民生观的发展轨迹并不是事先预设的,而是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民生实践中开辟的,随着民生诉求的逐步展开,与之相应要求的民生观念会逐步得以显现。民生诉求也将在民生观的指引下步入民生所固有的建设轨道中。再次,“三位一体”的民生观并不是单向度、直线式的演进,经济民生、权益民生和文化民生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特点,展现出不同的形式与内涵。不论是经济民生还是权益民生以及文化民生,三者不单单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民生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中民生诉求的积极回应。改革开放进程中,民生观的致思取向与研究主题,与每一发展阶段的民众生存与发展的诉求完全契合,此种契合既有历史的映照,又直面民生现实,体现了对民众生活境况的深切关怀,并始终以解决民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为滥觞和依归,形成了建立在具体民生实践中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民生观。民生观的社会历史性特征表明,民生建设是一个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运动过程。从时代规定和社会历史方位上考察民生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自觉把握社会主义民生观念变迁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基本趋势的核心维度。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8]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北京:三联书店,1988.
- [9]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
-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牧仁)